

趙時春詩詞校注

(上冊)

• 杜志强 校注

詩賦研究叢書

趙逵夫 主編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閱覽

I 222.808
2014/1

詩賦研究叢書

趙達夫 主編

杜志强 校注

趙時春詩詞校注



(上冊)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詩賦研究叢書》序

趙遠夫

文學領域中，什麼最能體現中國文化的特質？詩賦。人們常說，中國是詩的國度。詩是語言的藝術。儘管世界各個國家文學的百花園中都有詩，但是，中國的詩歌產生於中國文化的土壤，是獨特的漢語藝術。

漢語最大的特徵，就是單音節，無詞尾變化。古漢語則一字一音，一音一義，無附加成分。雙音詞一般由單音詞組合而成，伸縮分合甚便。漢語又是以漢字為記錄符號的。漢字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的結構特徵，一定程度上減少了書面語交際中誤解的機會，又在表情達意和讀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謂「文言」，其詞語的組合搭配，詞序的變化，用詞中的借代等，都十分靈活，在體現語意的輕重緩急和此輕彼重、此重彼輕以及與其他事物的關係等方面，不必加附屬句即可通過詞語句法的變化含蓄地表現出來。抒情言志，通幽達隱，以有限的文字表無窮的含義，實非其他語言文字可以比擬。





又由於方塊漢字一字一音的特徵，中國詩歌在語言佈置方面可以做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齊同節奏音律上的錯綜變化的統一；對仗、駢儷的藝術美也因而形成。

詩在本質上是抒情的，小說在本質上是敘事的。中國傳統的詩歌根植於中國文化的土壤，而長於抒情。黑格爾在其《美學》的《抒情詩》一節中說：

在對東方抒情詩方面有卓越成就的個別民族之中，首先應該提到中國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來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二〕}。

儘管黑格爾對中國的詩瞭解不是太多，但也道出了個中真理。

中國詩歌抒情特徵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三〕}，但同漢語漢字的特徵應不無關係。

但是，詩畢竟是世界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學式樣。真正由漢語漢字的獨特性而形成的我國特有的文學式樣，是賦。駢文亦以駢辭儷句爲特徵，但駢文中有些^{〔四〕}不屬於文學的範疇，故這裏祇說賦。

所以說，在文學的領域中最能體現我國文化之特質的，是詩賦。

自《詩經》最早地集結了我國民族抒發喜怒哀樂的歌唱和反映當時政治禮儀、社會風俗的詩篇之後，屈原融合南北文學，寫出了千古絕唱《離騷》，從而登上了世界文學的高峰。此後賈、枚先後承風，開漢賦先河；馬、揚以巨麗爲美，潤色鴻業；班、張賦京都，趙、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佳構。及至六朝，則詩人迭起，賦家如雲。到唐朝，則無論詩，無論賦，都是美不勝收，如初唐四傑，

李、杜、韓、柳，及樊川、玉溪，豈止是詩壇神筆，實亦賦苑聖手。宋代以後，詩、詞、曲、賦俱有發展變化，其切今轍古者，代不乏人。

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爲我國民族精神的確立時期，而《風》《騷》輝映，也奠定了我國文學的優良傳統。漢唐盛世，一以賦睥睨八荒，一以詩雄視百代。則《風》《騷》、詩、賦，不僅是中國文學文化的寶藏，也是我們民族精神的體現和中華民族統一團結的紐帶。

爲此，我們在文學研究的領域中選擇了詩賦，決定編輯出版一套《詩賦研究叢書》。

這套叢書中既有老一輩學者幾十年研究心血的結晶，也有中青年學者在新的社會環境中所作的可貴探索；既有研究專著，也有對作品的整理、詮解和評注。後者主要是想在目前被忽略了的方面做些工作。當然，某些熱門課題中，我們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將提出來與學術界朋友們共商。希望得到學術界朋友的支持與批評指正。

一九九三年五月於西北師大中文系

【注釋】

〔一〕黑格爾著，朱光潛譯：《美學》第三卷（下），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版，第二三一頁。

〔二〕黑格爾認爲，哪個民族的詩較發達和成熟，應同該民族的特性、時代觀和世界觀有關。他說：「在這些民族





特性，時代感和世界觀之中又有某一些比另一些更適宜於詩，例如東方的意識方式比起西方的（希臘的是例外）就較適宜於詩。在東方，未經分裂的固定的統一的有實體性的東西總是起着主導作用。這樣一種觀照方式本來就是最真純的，儘管它還不具有理想的自由。」見同上，第二七頁。

前言

趙時春（1508—1567），字景仁，號浚谷，平涼（今甘肅平涼市）人，嘉靖五年會元，是明代嘉靖年間的著名文人，也是隴右歷史上的著名作家。他早年是「嘉靖八才子」之一，憑借着優秀的科舉成績和穎異的才情而贏得了很高的文名，但是，由於創作旨趣的改變以及強烈的經世思想、坎坷的仕途、長期偏居平涼一隅等原因，在他創作生涯的後期，早年贏得的文譽並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提昇，這也限制了他文學創作和成就的推介。隨着他的離世，其文學影響也逐漸冷卻、消沉。

今天，隨着文學研究的深入和隴右文化的繁榮，趙時春逐漸得到學人較多的關注和研究，產生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比起同時的作家如唐順之、王慎中、李開先等，學界對趙時春的研究顯然是冷清的。針對這樣的研究現狀，我們選擇了「趙時春詩文整理」這一課題，先後做了趙時春文的校箋和詩、詞的校注工作。由於詩詞和文的整理體例不完全相同，所以無法放在一起出版，祇能分為兩部書，其中《趙時春文集校箋》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於二〇一二年出版。在該集的《前言》中，我們介紹了趙時春的研究現狀以及趙時春仕履、交遊、人格、思想、評價等問題，本書都不再重複，僅討論趙時春





的詩歌創作及相關問題。

一 「詩學初唐」與趙時春的詩學思想

朱彝尊曾經這樣描述明詩的發展與演變：

明三百年詩凡屢變，洪、永諸家稱極盛，微嫌尚沿元習。迨「宣德十才子」一變而為晚唐，成化諸公再變而為宋，弘、正間三變而為盛唐。嘉靖初，「八才子」四變而為初唐，皇甫兄弟五變而為晚唐，至「七才子」已六變矣。久之，公安七變而為楊、陸，所趨卑下，竟陵八變而枯槁幽冥，風雅掃地矣「一」。

拋開朱彝尊文字中的褒貶評價，僅就其中的事實描述而言，「八才子」四變而為初唐」明顯是將「嘉靖八才子」看做嘉靖初年詩歌變革的代表。

又：《四庫提要·〈閑居集〉提要》云：

嘉靖初，開先與王慎中、唐順之、熊過、陳東、任瀚、趙時春、呂高稱「八才子」，其時慎中、順之倡議盡洗李、何剽擬之習，而開先與時春等復羽翼之。

四庫館臣認為，「嘉靖八才子」的文學主張主要是「盡洗李、何剽擬之習」，即反對李夢陽、何景明等人模擬過甚的詩文風氣。再聯繫前引朱彝尊的描述，那我們可以肯定，「八才子」用以反對李、何的理論主張就是「詩學初唐」。這些嘉靖五年、八年的新科進士們，想要立即在政壇上有所作為是很難的，但如果憑借其才名和優秀的科場成績，在文學上同聲相應，形成一定影響，那完全有可能。於是，他們在反對李、何這一點上形成了共識，因而形成了一個頗具規模的群體。胡應麟的話可作為補充：

嘉靖初，為初唐者，唐應德、袁永之、屠文升、王汝化、任少海、陳約之、田叔禾等，為中唐者，皇甫子安、華子潛、吳純叔、陳鳴野、施子羽、蔡子木等，俱有集行世「二」。

這些「為初唐者」再加上「嘉靖八才子」，人數不算少。

今天來看，「詩學初唐」不僅僅是一個文學領域內部的革新，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嘉靖初年的政治革新，反映了這些新科進士們的政治期待和強烈功名心。他們希望以文學革新的方式去贏取聲譽，以此為階梯來走向仕途的快車道，進而獲得理想中的政治地位。不過事與願違，他們從嘉靖九年之後被相繼罷官、各奔天涯，「詩學初唐」也祇能成為一個沒有明顯成果和深遠影響的文學變革（從「詩學初唐」中蛻變出的「唐宋派」卻有深遠影響）。

趙時春的「詩學初唐」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進行的。可遺憾的是在現存的趙時春作品中，我們看不到他明確的復古主張。但通過前面引文至少可以肯定，趙時春在剛剛中進士後即加入了「詩學初唐」





的創作之中，他也以此來反對李夢陽、何景明等人的「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文風。那麼我們會問：為什麼趙時春不明確表述自己的詩學思想呢？他是在故意回避嗎？

其實趙時春的許多文章中都有其文學思想的流露，所以，他對詩學思想是有着明確表述的，祇是他從不刻意去宣揚復某某之古或學某某之詩，比如「學初唐」之類的口號，這同他與「唐宋派」之間的關係也很相似。趙時春與唐順之、王慎中等「唐宋派」領袖之間關係密切，但唐、王二人成了「唐宋派」的開創者，而趙時春卻從來沒有被列入「唐宋派」，儘管他的詩文創作以及理學思想與「唐宋派」都很接近，但他從不表述尊唐宋或復漢古，這也許就是趙時春對唐宋派的中庸立場。由此推論，趙時春早年在詩歌創作中學初唐，但在詩歌理論上不明言復某某之古，也應該是合理的。

詩學初唐運動歷時並不長。嘉靖九年，趙時春因罷官而離開京城，嘉靖十三年，王慎中、唐順之等人相繼離京，從此，「八才子」各奔天涯，仕途坎坷。隨着他們學術旨趣的轉移，早年詩學初唐的創作和主張逐漸遠去，他們各自走上了差別迥異的文化之旅：比如王慎中、唐順之沉浸於理學、史學，趙時春從事子史著作，熊過、任瀚等人的《易》學頗有特點，李開先鍾情於戲劇創作等。在這樣的背景下，趙時春的詩學主張有了較明顯的改變，早已超出了「詩學初唐」的範圍。他越來越看重詩歌的內容，認為詩歌不僅要抒情，而且要抒發正統的、高雅的情，要抒發有益於世教的情，對於詞采過於華美的作品他評價並不高。如他說：

夫情始於無形，觸之而後寓，感之而後形，然則在明（引者注：在明，姚文炤，字在明，趙時春在刑部時的僚友）之情雖謂之對雨可也。於是在明之僚友即風人之義以暢其鬱陶之懷，而踴躍其進為之志，蓋將約之以禮義，非止為情而已也〔三〕。

這裏明確說詩歌表達感情要「約之以禮義」。他還對胡侍詩歌「富密」的特點表示了委婉的批評，主張詩歌應該以自然的語言抒發自然的感情〔四〕。更有甚者，他認為「道」散佈於宇宙之間，人若得「道」，則「道」發之於形聲，成諸詩，那樣的詩纔是有意義的詩，如果僅僅是「程文詞之今古，而誇其工豔」，則為君子所不取〔五〕。

可以看出，在趙時春生涯的後期，其詩學思想越來越接近理學家的主張。這與趙時春強烈的經世思想是緊密相關的。由於要經世，所以就不要浮誇，而重實用；不要小藝，而重大道。如對於書法，他認為：

書，六藝之一，聖人所以教人，然特小學事耳，至於大學非所急也。少而不說學，長而怠所職，是聖之棄而書反為蠹也。若夫大學之道，則以心神、天下、國家為先，而奚有於書〔六〕？

應該說這是趙時春文藝思想的清晰表述，「心神、天下、國家」佔有重要地位，藝術因素已經退居其次。

假如趙時春的詩歌創作嚴格遵循其詩學思想的話，那他的詩歌就成了理學的義疏。事實上在創作





中，趙時春詩歌的抒情性十分鮮明，不僅有恬淡閑適的篇目，也有雄心勃勃及抑鬱憤激之作，部分篇目為了競誇詞采、競美文華，用典繁多，風格繁豔。這種作家文學思想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差距，古今多見，不足為奇，也不用再去多作解釋。

二 趙時春的詩歌創作

趙時春今存詩一千五百餘首，均收入《浚谷詩集》中，共六卷；詞四十餘篇，收入《洗心亭詩餘》中，僅一卷；詩詞總量相當大，內容龐雜。我們這次的整理，合詩詞為一冊，共七卷。茲分以下幾個方面來介紹、分析趙時春的詩歌創作。

（一）趙時春詩歌創作的一個鮮明特點是才情慷慨奔放，「秦人而為秦聲」

其一，詩歌才情慷慨奔放。

趙時春十四歲中陝西舉人第三名，且得到當時陝西提學副使唐龍的大力讚譽，十八歲中會試第一，這說明趙時春確實有着過人的才華；反映在其創作中就是詩歌顯得才情慷慨奔放，豪邁不羈。《明史》卷二百《趙時春傳》云：「（時春）文章豪肆，與唐順之、王慎中齊名；詩伉浪自喜，類其為人。」「伉浪」即率直豪放。《四庫提要·〈趙浚谷集〉提要》云：「詩文多慷慨自喜，不可拘以格律。胡松序所謂「秦人而為秦聲」，亦其風氣然也。然則史所謂「文章豪肆」者，長短俱在是矣。」館臣給以

「慷慨」的評價，與《明史》「伉儷」的評語一致。這些描述和評價充分說明趙時春有着豪邁不羈的才情。

趙時春詩歌的數量也是其才情的顯示。其詩歌動輒一題六首、十首甚至二十四首，二三首的篇目比比皆是，許多篇目篇幅也很長，可以肯定，若沒有充分的才情是較難做到的，當然，這也從另一方面說明，趙時春可能是有意在以此來顯示才情。《四庫提要·〈閑居集〉提要》評價李開先的詩歌創作是「所作隨筆揮灑，一篇或至數千言，其詩亦往往迭韻至百首」，其實這些話移來評價趙時春也是準確的，富於才情大概也是趙時春、李開先等人被稱為「才子」的重要原因。

其二，「秦風」特色明顯。

平涼古屬秦地，秦民的慷慨好戰由來已久，《詩經·秦風》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悲壯慷慨的尚武精神。趙時春生於斯、長於斯，濡染着秦風，因而他性格中的秦人烙印很明顯。比如他一生積極主戰，主張對河套蒙古、西海蒙古以及倭寇要積極用兵，而對嚴嵩、仇鸞等人的消極抵禦則給予了尖銳的抨擊。這樣的思想、個性反映在其詩歌創作中，就體現出與「秦風」一脈相承的特點來——率直慷慨、積極言戰。因為要慷慨抒情，所以就「不可拘以格律」，因為不拘格律，所以趙時春詩歌最有特色的不是律詩，而是歌行體古詩，歌行體也理所當然地成了他詩歌成就的代表。然則其獲得諸如「豪如太白而不淫，雄如子美而多變，疏暢跌盪如司馬子長、班叔皮」^{〔七〕}、「豪宕闊肆如司馬子長、李太白」^{〔八〕}之類的評價，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與此相應的是用典。用典在一定程度上會妨礙自由抒情，因此，趙時春詩歌中，除了部分應酬之作為了競誇才富而用典繁複外，自由抒情的詩篇用典很少，這也可看成是「秦風」慷慨抒情的需要。同時，趙時春要描繪的，是西北尤其是隴東高原粗獷的山河、高寒的物態和豪放的民情，顯然，「秦風」更適宜於描寫這樣的風土人情。從這個角度來看，趙時春詩歌的「秦風」特色，不僅是秦地的文化傳統，更是他描摹西北山河的選擇。而他的選擇，也為被冷落千年的隴右山川增添了一份厚重的人文氣息，使之有了一次被濃墨重彩地推向文學前臺的機會。

趙時春詩歌「秦風」特點的另一方面是題材取向上的現實主義。他用詩歌描寫隴東高原上的自然物態，抒發自己的慷慨情懷與懷才不遇的幽怨，而且積極地用詩筆評論時政。當時的許多政治事件在他的詩歌中都有反映，如俺答擾邊，曾銑、夏言之死，仇鸞、嚴嵩之死，徐階主政，隆慶新政等明中期的重大政治事件，都在他的詩歌中有直接反映；一些微妙的政治事件如「大禮議」等，儘管他沒有明確評論，但部分詩篇如《贈楊評事》等也還是委婉地流露出遺憾情緒。對於嚴嵩黨徒，趙時春堅決不與為伍，如《答諸尚寶子興》就是對嚴嵩黨羽諸傑的委婉拒絕；尤其是《寄寧夏撫臺王鑒川》一詩，在與王崇古的寄贈中，趙時春例舉嚴嵩罪證以及因嚴嵩讒言而獲罪的諫臣，猛烈抨擊了嚴嵩主政以來放殺諫臣、消極禦邊以及由之而導致的邊患日趨嚴峻的現實，期待王崇古能像周亞夫那樣為國幹臣，事實上王崇古也確實沒有辜負趙時春的期望，在趙時春去世後，他為趙時春請恤典、作墓表，力主「俺答封貢」，終於解決了蒙古擾邊的難題。可以看出，在能夠交心的朋友面前，趙時春敢於對時政

進行毫無顧忌的批判。趙時春的詩歌在題材取向上是現實主義風格，應無疑問。

趙時春還喜歡模仿杜甫，典型作品如《秋思》八首、《旅旬懷古》八首以及長詩《西歸》等。前兩組詩模仿杜甫《秋興》八首、《詠懷古跡》五首，是趙時春被下獄後、首次貶官的歸途中所作；《西歸》則模仿杜甫長詩《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是趙時春第二次被貶官、至家時所作。這些作品是趙時春學習杜甫現實主義風格的見證。

但是，這並不排除趙時春部分詩篇具有浪漫主義特點。趙時春才情豪邁，在許多詩篇中似乎有意模仿李白的奇思壯采，少數篇目也似在模仿韓愈的奇特意象，這使他的詩歌也具有浪漫主義傾向。不過相比較而言，現實主義仍是其詩歌創作的主流。而且，這些浪漫的詩篇主要創作於趙時春年輕時期，如《華山謠別張南川侍御》《固原南池泛月奉陪唐尚書，與劉總戎、段正郎、樊兵憲同舟》《寄黃德兆》等詩，作於趙時春三十五歲之前，而他晚年則很少創作這樣的詩篇。這也說明，浪漫主義風格祇是趙時春詩歌創作的一個側面，倒是現實主義創作貫穿了其一生。浪漫主義風格的詩篇對於提升趙時春的詩歌創作藝術以及其詩歌創作的豐富、多元化是頗有意義的。

（二）趙時春詩歌豐富多彩的內容

其一，感時傷事、時有譏刺的詠事詩。

趙時春強烈的經世思想使得他的目光始終關注着時局、國事，因而，當國政日非時，他用詩歌感時傷事，當新政頒佈時，他在詩歌中由衷地體現出欣喜與歌頌，而對於權臣專權，他用詩筆予以無





情鞭撻。如《憶昔行》中提到劉瑾專權和劉六、劉七起義，《上京樂》中諷刺錢寧、江彬弄權和正德皇帝豹房穢聞，《答巡撫甘肅楊都憲書稱咸寧侯相譖》中直擊仇鸞之諛佞，《唁曾總督》《唁夏閣老》《唁分宜嚴氏》三首分別批判曾銑、夏言、嚴嵩三人，其中對曾銑、夏言的批判似可商榷，但對嚴嵩的批判則是合理的，對時政革新給予美頌的，如《寄上少師徐公》一詩。該詩作於嘉靖四十三年，徐階時任首輔，政局好轉，趙時春讚美徐階主政後「半載肅貞百弊除」，並期待着「薊門滄海患當消」，即消除北蒙南倭的邊患；他還寫自己「壯年曾忤史彌遠，豈意重丁董宋臣」，即自己得罪夏言、嚴嵩事。趙時春與徐階相交三十年，關係密切，在徐階主政後，趙時春抒發了由衷的讚美和期待。

在《明史》中，趙時春是作為邊將而被立傳的，這也可以看出古人對趙時春的定位；與此相應，趙時春在詩歌中表達了對邊患的密切關注和擔憂，如《河西歌》十二首、《太原行》、《固原告急》六首、《平涼兵覆保安、懷來間》二首以及他任山西巡撫時作於塞上的許多詩篇等。其中《固原告急》六首便是直接寫明軍「黑水苑大捷」前的形勢；由於固原南鄰平涼，而平涼又是趙時春家鄉，所以趙時春憂國憂家，恨不能手提勁兵保衛家園。

趙時春對時事的關注，還體現在他對民生的感傷上。趙時春有一顆為民請命的赤子之心，他前兩次罷官，都是由於直諫；而當他身在江湖時，卻依然心憂天下，至死不改。他在許多送別平涼官員的文章中都大聲疾呼平涼百姓之困苦，希望那些進京的官員能傳達自己的呼聲。他的詩篇也是這樣，如《答巡撫翁都憲僕時在野獲睹尺書》一詩，是為答復其同榜進士、時任陝西巡撫的翁萬達而作。他在申

述平涼猾吏縱橫、百姓困窮的現實後，心情悽然，「我行對此心慘怛，敢將民瘼告高賢。初秋爽氣肅鷹隼，懲一儆百政之先」，希望翁萬達能用猛政，懲一儆百，以救民瘼。再如《雨雹歎》二首，描寫盛夏隴東大降冰雹，殘損莊稼，百姓收成無望，祇能「典新買熟酬公私，公賦未如私家半。冰雹如銀積如山，癡官見之豈等閑。不如緼負他方去，明朝且得開心顏」，在無法完成公私賦稅的情況下，百姓開始想着逃亡他鄉。在這些詩篇中，浸潤着趙時春對民瘼的深切同情。其《哀田家》等詩也是如此。

其二，深寓身世的唱和、贈別詩。

唱和、贈別詩在趙時春的詩歌中蔚為大宗。據我們的統計，其唱和、贈別詩共五百五十餘首，寄贈人物眾多，僅姓名、生平可考察清楚者即近一百二十人，這些人物對於考察趙時春之交遊及其文學與學術背景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僅就這些詩歌而言，由於寄贈人物大多是當時的進士階層，出於競美文華的需要，這些詩篇大多用典繁密，不乏優秀的篇章，尤其是那些寄贈給與趙時春一樣落拓或仕途坎坷者的詩篇，往往深寓作者的身世之感，曠達悲涼，具有強烈的感染力。一些七言長篇歌行，如《重贈吳二應軫》《贈呂幼誠》《華山謠別張南川侍御》《寄黃德兆》《哭守正》等，感情深沉，語言華美，能代表趙時春詩歌創作的成就。

典型如《寄包蒙泉侍御》，這是趙時春贈給湖廣按察使包節的詩篇。當時包節謫戍莊浪衛（今甘肅永登），貶謫原因是包節欲彈劾宦官廖斌，反被廖斌誣以祀顯陵（嘉靖父正德之陵）不敬之罪，而嘉靖皇帝又極重孝道，遂處包節以重罪。在這首詩中，趙時春給包節以深切的同情，對狐假虎威的宦官給

